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
学术研究史丛书

哲学专辑

楼宇烈 主编

王锦民 / 著

中国哲学史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

哲学专辑

楼宇烈/主编

中国哲学史研究

● 王锦民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研究/王锦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ISBN 7—211—05114—0

I. 中... II. 王... III. 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383 号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中国哲学史研究

ZHONGGUO ZHEXUESHI YANJIU

王锦民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13.75 印张 2 插页 361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11—05114—0/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王锦民，1963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美学史。1997年~1999年，担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代表著作有《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1996年）。曾以《上帝的棋局》（1999年）一文获德国魏玛国际征文比赛第六名。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陈祖武 杨泓 主编)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
宋史研究
辽西夏金史研究
元史研究
明清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

文学专辑(傅璇琮 主编)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戏剧研究
中国词学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西方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哲学专辑(楼宇烈 主编)

中国哲学史研究

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与研究
儒学研究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
伦理学研究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研究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俞金树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杨 泓 陈祖武 俞金树 傅璇琮 楼宇烈

总策划：傅璇琮 俞金树

策 划：刘亚忠 刘 石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出版说明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 20 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 20 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其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

1998 年初，我社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共同筹划编纂一套反映 20 世纪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丛书，并定名为《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后，我们约请到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四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并由他们规划框架，制订体例，拟定选目，延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承担编写工作。

在诸位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这部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系列近 30 册的丛书终得面世。从酝酿到成书的六年间，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中国传统学术包容广博，蕴涵深厚，讲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 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科，亦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质。唯其如此，这部丛书的选题



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不仅限于对各学科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各书的布局 and 风格，亦不强求体例的划一，旨在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驰骋其表现才能，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这部丛书面世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并指出，要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体会《意见》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到这部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希望也相信这部丛书能够为《意见》中所指出的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做出自己的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导 言

一、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在整个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于从内容上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促成了中西哲学的交流与融会；另一方面在于从形式上将中国哲学由传统的形态，改造成现代学术，为中国哲学在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 世纪的哲学研究是非常广泛的，贺麟在《五十年来来的中国哲学》中，对 20 世纪前期的哲学发展做出了一个整体的概述，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贺氏指出该时期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一）陆王之学得到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到了新的调整；（三）理学中的程朱、陆王两派得到调节；（四）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贺氏把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源头追溯到康有为，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复兴陆王之学的前驱。至于章太炎、欧阳竟无的贡献，则是将儒学和佛学会通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贺氏以为，20 时期前半期的陆王之学之所以由粗疏到精微，乃因精研佛学之故。此后的梁漱溟、熊十力，都是由儒、释而来的新陆王之学，到了马一浮，更以极深睿的识度将儒释、朱陆贯通为一体，因此最受贺氏推崇。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贺氏介绍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三书，贺氏以这三部著作作为 20 世纪前



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

二是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贺氏从严复开始，重点讲到了张东荪、郑昕、陈康、洪谦等人，他们在绍述西方哲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另外，从王国维开始，学者在绍述西方哲学的同时又力图与中国哲学相融会。贺氏特别将金岳霖、冯友兰的哲学看作是中西哲学融会的产物，没有在专论中国哲学的部分讲他们的思想。在金、冯二氏之后，贺氏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年轻学者，其中着重讲了沈有鼎关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设想，中国哲学未来要建立的是穷理尽性的唯心论大系统，积极的宗教也要兴起。在唯心论的趋势下，贺氏讲到了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此外贺氏还讲到了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领域的学者及其贡献，这些领域的学者如黄建中、谢扶雅、方东美、宗白华等人的思想，也都具有中西融会的特点。

三是时代思潮的演变。贺氏在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实用主义、辩证唯物论两大思潮。^①

贺麟对于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哲学的范围，有自己的理解。他起初写成《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这篇文章收入《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时，作为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可见贺氏心目中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有传统根源的、在儒学和佛学调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心学”，而金岳霖、冯友兰在中西融会基础上建立的“新理学”则不在其列。对于中国哲学的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有些狭隘了，因为按照这一标准，后来发展起来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家哲学，也会被排斥在外。如果把贺氏所说的第一个方面“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和第二个方面中的“中西哲学的融会”部分整合在一起，则可以形成一个关于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广义概念。尽管这个中国哲学概念主要是从 20 世纪前期的哲学发展中概括出来

^① 详可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的，但基本上可以适用于整个 20 世纪。这样一个中国哲学概念，无论是对于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史，都是非常必要的。

要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做出合理的叙述，除了界定出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概念之外，还有必要理清关于哲学史的一些基本观念，以此作为全面展开的基准。

首先，哲学史是对以往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叙述，这一叙述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它能揭示哲学的进步历程。哲学的进步与一般知识的进步有所不同。哲学的进步一方面说是新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哲学思想，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成果。一种哲学能为哲学史所记述，一个首要的条件即是它必定是一种新思想，重复性的思想对于哲学史来说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它又总是旧的，从哲学起源之后，新哲学总是在旧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新哲学总是通过扬弃旧哲学的方式向前发展。新哲学对旧哲学的利用，并不一定按照历史的自然顺序，它可以是与最近的前代相连续的，也可以是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在各个学科中，哲学的发展与其自身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

哲学的进步一方面说是最终的，任何一种哲学，特别是那些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哲学，总是以发现最终的真理为己任，如果一种思想只是以有限的知识、相对的真理为目标，如果一种思想没有将人类的智慧在可能的条件下发挥到极致，则不能称其为哲学。另一方面说它又是过程中的，尽管每一位哲学家在主观上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是最后的真理，但是因为哲学家在智慧上的个体差异，因为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是如此的复杂、如此庞大，很可能超出了人类思维的能力限度，故而每一种哲学又都是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的。以往的哲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发现最终的真理，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是一些真理的元素，只有在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全部变化都有清楚的认识，并且用理智的形式把握住它，才能获得最终的真理。显然，最终的真理只是与我们的理想相关，不可能在现实的哲学中。



其次，哲学史并不是一些不同的哲学意见的历史陈列。我们在思考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时，会发觉我们的思路总是朝着某些普遍的方向行进，这些方向似乎是天然注定的，即便是要设法避免都非常的困难。这些思想的模式或者说思想的普遍方向，即是由历史上的哲学传统所逐渐造就的。

确立思想的模式或普遍方向，一个必要的步骤是为其寻找到传统的根基。对于我们所界定过的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说，离开了传统是不能存活下去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离不开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为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础。我们所看到的 20 世纪各种有价值的新的中国哲学的体系，都有它的传统源流。尽管这些体系都包含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当代目的，但思想却是从传统中重新提取出来的，传统的根基越深越牢，所提出的问题也就越有价值。不过，新的中国哲学对传统的依赖，一般不是针对以往的中国哲学的全部，总要落实到一段历史、一个方面，因此其所复兴的，也不是笼统的中国哲学，而总是保有汉学、宋学之分，心学、理学之别，诸如此类。中国哲学史上遗留的思想异同问题，可以适当调和，但很难彻底解决，对整个中国哲学做出全面的总结只是一种妄想。新的哲学所依赖的传统面越宽，往往越不彻底。

第三，20 世纪中国哲学已经不太可能在单一的哲学传统下发展，多种文化并立的新局面使中国哲学必须通过比较自身传统与其他哲学传统，在一种更为广泛的背景下重新确认其普遍性。这一新的广泛的背景即是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自 1921 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确立了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大格局之后，中国哲学几乎都是在这一格局之内展开的。张君勱于 1935 年作《明日之中国哲学》，也是力图从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比较中探求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在整个 20 世纪，中西的比较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早期与印度文化的比较对中国哲学的促进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晚近的发展又增加了在东亚范围内的中、日、韩之间的比较。总之，比较的理念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中国

哲学史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比较的方法被广泛的运用。

第四，对于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来说，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可以概括成两句话：即哲学以为哲学史，即哲学史以为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什么样的理解，则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有什么样的理解，则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中国哲学，二者是互为前提、互相包含着的。这个特点虽然不能概括 20 世纪全部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但至少在我们所界定的中国哲学概念的范围内是占主流的。

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紧密关系，意味着一种好的中国哲学，不仅在于其能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做出解答，而且在于其能够最适宜地在多种文化背景中解释中国哲学史；同样，一种好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于其能够对自身历史有合理的解释，还在于它能引导出一种在新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哲学来。

二、学术现代化与精神意向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从属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经历了一个学术现代化的过程。学术的现代化是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导致这一变化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术自身的因素。学术的现代化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西化的过程，认为现代化只是中国学术的特殊经历，而西方的学术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一个类似的学术现代化的过程，只是西方较之中国领先一步而已。

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曾经指出，在西方 19 世纪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中，有两个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一是方法论，二是学科化。怀特海以为，19 世纪最大的发明即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使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成了现实。所谓发明的方法，即是能够把既有的科学思想转变成技术成果的方法。这个时代的很多变化细节，诸如蒸汽机、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等等，都可以不谈，关键在于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英国



的工业革命即由此开始。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学中出现了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学科分化，尽管这一革新可能蕴含着严重的弊害，但是它却是 19 世纪科学技术乃至一般知识开始爆炸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西方学术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①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是从方法论的革命开始。胡适是这一方法论革命的首倡者，在哲学与人文学这一领域，他全面地引入了西方的学术方法，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整理国故，从而使中国学术开始了现代化转变。由这种方法论的革命再进一步，更具体的哲学的方法论也被引入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主要是用西方的一般学术方法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到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进展到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这两者既是连续递进的，又构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此后汤用彤运用西方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写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此，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典范基本确立起来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观念的引进，是学科建构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与 19 世纪欧洲的情况相类似，方法论和学科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些研究者常常把中国 20 世纪初所进行的学术的现代化和对旧传统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似乎现代化与传统是水火不容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误解。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确蕴含着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学术界常用激进主义（radical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把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分为二。^②这一大的划分，主要是针对对待传统的态度而言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激进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都在学术上实现了某

① 详可参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六章《论十九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

② 详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载在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

种现代化。因此，学术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这一变革是通过一整套抽象化过程实现的，如黄远庸、梁漱溟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逐级的变化，由器物到制度，再由制度到思想文化，最终落实在伦理思想和人生哲学上。这样一种变化实际上是一个思维的抽象化过程，中西文化在实际层面的千差万别被归约到哲学上的抽象思维的差别。哲学也由此成了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基本领域。

但是，这种指向哲学的抽象化过程并不是很轻易就能完成的，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首先瓦解传统学术，因为传统学术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态，自然地抗拒着向哲学的转变。无论是今文学、古文学，汉学、宋学，这些传统学术形态必须经过一个瓦解过程，才能转变为哲学，或者说能够被抽象地继承为哲学思想。林毓生曾经分析过康有为的今文学和章太炎的古文学，认为无论何者都起了对传统经学的破坏作用。^①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正是以非经学的面目出现的，随之而来的疑古和整理国故，对经学的瓦解更是空前的。对经学体制的破坏是学术现代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对宋学的改造，这一步则是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进行的。20 世纪初的学术与思想的主流常常被冠以“新宋学”的名目，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以复兴宋学作为起点。

在经学的瓦解和宋学的复兴之间，有一个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极深的思想变化，即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解越来越抽象化了。陈寅恪曾说，中国文化之定义体现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一类思想是抽象之理想，需要依托于社会经济制度。而自道光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因此使“三纲六纪”一类的儒家理想变得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自己就逐渐地萎缩消沉了。陈氏以为，如王国维即是为这一类的中国文化精神之所

^① 参见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



化，因此也随着这一类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消亡而身殉。^① 陈氏所说的“三纲六纪”一类的儒家理想，在 20 世纪初逐渐消亡，这种消亡其实是以转变的方式完成的。换句话说，儒家的思想借助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转化，由讲“三纲六纪”一类的社会伦理理想转变为讲理气、心性一类的纯粹哲理。前一类的儒家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无所依凭，后一种儒家则通过与西方的哲学相比附，从而获得了一种在学术与思想上的独立。不过，前一类儒家是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消亡的，后一种儒家却未必是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的要求下产生的。

20 世纪初的学术现代化是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进行的，这一点也造成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某些特殊性。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崩解，使学术与思想无法依据自然的次序，由社会基础逐渐地产生出来，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学术与思想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在一种凌空蹈虚的局面中。作为支撑学术与思想的基础的，不完全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而是一种空想性的社会存在，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除了有巨大的社会变革让人们一时无法适从的原因之外，晚清公羊学的进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过激批判，交织着促成了一种对现实的脱离趋势。

可以想见，当社会变革使得社会基础变得不可依凭，传统学术也不可依凭时，则所能依凭的只能是一种信仰性的精神凝聚。这种信仰性的精神凝聚体现出某种意向，或者向前，或者向后，或者向外，或者向内，或者激进，或者保守，它们交互联系、交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些最基本的精神意向。

所谓精神意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精神性的，意指精神性的信仰作为学术与思想发展的动力，并使学术与思想的发展

^① 参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呈现为一种主观的目的性；二是这种精神性的信仰，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使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趋向。这些基本的精神意向可以成为客观的历史对象为我们所研究。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也都分布在这些基本的精神意向中，或者说，是顺应着这些时代思潮向前发展的。

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基础决定着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这一历史规律，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来说，社会基础对于学术与思想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并且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是因为 20 世纪初的特殊历史，使这种影响退隐到了底层，表层所显示的则是某些精神意向的影响更为活跃。学术与思想的发展可以被设想为在双层动力的推动下发展，底层和表层之间具备一致的，或者对应性的关系，因此对于处在 20 世纪初的学者来说，他可以将其研究自觉地关联于底层的经济基础，也可以自觉地关联于表层的精神意向。不过，20 世纪初的社会状况是如此复杂，以致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聚讼纷纭，争论了很久都难以在学术上形成统一的意见，更多的学术与思想是建立在学者个人的理解之上，而这些个人理解很容易受空想性的因素所左右。所以总的来说，20 世纪初各种精神意向的活跃，积极地促进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变革，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三、本书的基本构想

作为一部学术史，以适宜的历史体裁，客观地描述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是本书的一个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本书在全面的史料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十位代表性的学者——胡适、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钱穆、熊十力、吕澂、侯外庐、牟宗三、唐君毅，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章节。本书所选择的十位学者，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领域都可谓出类拔萃。本书之所以选择他们是有客观标准的。他们中有些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莫立者，或者写出了这一学科的典范之作。有些人尽管用严格的中国哲学史标